

中国与安南：同一类故事的不同讲法

——朱珪的《安南怪谭》

王晴飞

朱珪的《安南怪谭》是改写安南故事的集子。单论故事情节本身,对于看惯了传奇志怪小说的读者来说,其实也并不能算得上太怪。若说“怪”,或者说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大约倒有两点可说。一是作者刻意制造的形式,每一篇故事正文后都有一则篇幅与正文相当的按语性质的“砵案”,介绍故事的不同版本,追溯其源流,并由此天马行空地引申出同类母题在不同区域的表现,尤其将其与中国同类故事比较。二是“安南”本身。自近代化以来,我们关注的外邦往往是欧美,“安南”与我们地理距离既近,文化上又系出同源,却常常为我们所忽视。

安南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领土或属国,处于儒家文化圈中,儒家礼教秩序在官方层面对安南一样有效。当然,由于地处四裔,儒家秩序网络的细密程度与中心相比或有差别。安南对中国的态度,如朱珪所说,亦如他们对中国伏波将军马援的态度,又爱又恨。他们崇拜“白马大王”(马援),但是又将马援留下来的中原士兵称为马留(大猴子)。⁽¹⁾

《安南怪谭》中的许多故事在中国亦有流传,双方分享着同样的母题,如安南灶君的一妻二夫格局来源的故事,与中国民间传说中张郎休丁香的故事;矫公罕无头争天下的故事与刑天抗争的故事;安南阿Q的故事、关于四象(四不象)那些不雅驯的故事等在中国也有类似传说,可见两者出于同源,双方分享着共同的母题和兴趣。《安南怪谭》中最能体现与中国文化心理相似而同样在中国也被文字记录的,是神僧转世、道友护持的故事。

《下一世欲主国家 这辈子必要出家?》是关于神僧徐道行转生李神宗的故事。该故事的前半部分是徐道行学艺为父亲报仇,杀死仇人大颠,并设计使其投胎到皇宫成为下一任皇帝的计划失败,后半部分则是他自己代替大颠转世,成为李朝神宗,以及化虎的传说。如果忽略血亲复仇的古老母题,这一故事的关键节点在于徐道行复仇的执着,神僧的转世,以及转世中自我迷失时前世道友的扶持。

徐道行结交的诸多道友中,最为相契的是高僧阮明空,阮明空年龄虽然小徐道行二十岁,佛法修为和神通造诣显然都远高于对方。他在和徐道行的交往中常常扮演导师的角色。他传授给徐道行预知术并与之联合施展,告知他内心埋藏最深的人是大颠,说出大颠未死的秘密;对于徐道行复仇的执着以及由此深陷因果的后果早有预知,并予以提示、教化。阮明空在变形术上的修为也远高于徐道行。徐道行破坏了大颠的转世计划后,心中畅快,去找阮明空时使用了变形术,化身老虎,却被对方一眼看穿——与之相对的是,之前阮明空施展三次变形术,徐道行一次都未能识破。阮明空因早已看到了徐道行陷于因果转世后的命运而深致叹息:

——道兄修行这么多年,
竟是要灵台自昧,
堕入那畜生道,
甘心做山君?

——山君只是小插曲,
只是把我也牵扯进因果
罢了。不过,眼下
道兄已经惹上
人君的麻烦了……
祸兮?福兮?
你的时机已经到了,可
我的时机还未到呢……

——还有见面的机会。
只是,那时道兄
不管是事先事后,
往事故人皆不记啦。⁽²⁾

徐道行施展变形术化为老虎,在这里带有预言性质,即徐道行转世后会“灵台自昧”,忘了本心,甚至可能“堕入畜生道”;“往事故人皆不记啦”也是阮明空对

徐道行转世中可能迷失自我的一种预示,而迷失的原因固然可能众多,但是徐道行对仇恨的执着以及由此牵扯到的诸多因果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后续故事中,徐道行转世的李神宗最重要的传说也正是“化虎”,足与前情印证。最终也正是阮明空进宫于密室中施展法术,使李神宗由迷返觉,重新变回人形。此时,“耳朵尖的太监和宫女,恍惚间还听到了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³⁾参诸本篇“珙案”,徐道行转世为李神宗后,又至少有过两次转世(先后转为乞丐、后黎朝神宗),可见虽有阮明空护持,李神宗免于堕入畜生道,终究还是数度迷失于轮回之中。本篇故事中阮明空的多次叹息,也正是说明他早就预知到了这一点。

阮明空的名字本身即带有佛教色彩,所谓明空可以是通晓明白“空”的道理,也可能是既“明”且“空”。如果我们从故事母题共享、传播的角度来看,“明空”也可以是两个中国和尚“月明”与“法空”的结合:月明+法空=明空。“月明和尚度柳翠”的故事,在中国多有流传。在《喻世明言》的版本中,柳宣教少年得志,出任临安府尹,城南水月寺竹林峰住持玉通和尚未来迎驾,柳宣教怀恨在心,令官妓吴红莲设计引诱玉通破戒,并留下证据,玉通知晓真相后沐浴坐化,临死前留下偈子曰:“我身德行被你亏,你家门风还我坏”,转世为柳宣教之女柳翠。柳家败落后,柳翠流落风尘,果然败坏了柳家门风。皋亭山显孝寺住持月明与南山净慈寺长老法空不忍见其迷失本性,相继度化,柳翠悟得前生因果,沐浴后坐化而去。月明,自然指的是本心皎洁如明月;法空,也是诸法皆空,劝人不必执迷世俗虚幻。安南高僧阮明空名字的解释取此意更为妥帖。高僧前生一念之差犯了淫戒,后世又执着于恩怨,堕落风尘,迷误更深,幸得道友为说因果,方才识得本性,由迷转觉。这类故事尚有同出于《喻世明言》的“明悟禅师赶五戒”。在这则故事中,五戒和尚犯了淫戒,为师弟明悟所讽,羞愤坐化,转世为毁佛谤僧的才子苏轼,明悟禅师预料及此,也同时坐化转世为佛印,时时度化,终于使苏轼觉悟本心,修行佛法,最终二人同时坐化,苏轼(五戒)也终于跳出轮回,成为大罗金仙。

徐道行与玉通、五戒故事的共同点,也是故事的讲

述者和读者共同的兴趣点,在于佛教的转世轮回和对人在转世过程中自我迷失的忧虑。两类故事里高僧迷失之因中都有对前世恩怨的执着,但是玉通和尚和五戒和尚的破戒,无论是主动(五戒)还是被诱(玉通),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色欲。高僧因色破戒堕落的故事在中国有很多,知名者尚有萧九娘诱巨德禅师故事,现代香港女作家中李碧华重写白蛇传故事的小说《青蛇》中也增添了青蛇色诱法海使其产生欲望的情节,作者和读者对于高僧破色戒这一母题持续不衰的兴趣,恐怕也说明中土男女大防更严,儒家秩序之网更密。

与《喻世明言》中这两则故事相比,朱珙讲述的徐道行的故事气息有明显不同,这和他拒绝赋予故事以明确的教化意义相关。过于强烈的教化性,会使故事从一开始便具有确定的目标,中途无论设计出多少歧途,最终的目的地却是一开头便已确定了的。而《安南怪谭》里那些即便是中途不断提示终点所在的故事,关注点也在于故事走向中的节奏,而非最终的目标。同样是对道友转世中自我迷失的担忧,无论是月明、法空还是明悟禅师,他们都很清楚知道如何做可以使其由迷返觉,也很自信可以做到这一点:阮明空则对命运和未来的走向并不能有明确预知——关于这一点,在徐道行学艺部分已有提示,即他学到的每一个神通法术,都是不完全的,传说中的“全本”都在印度,而父亲徐荣的那些友人传授法术给徐道行时明面上的理由都是请他去印度取来“全本”,尤其是预知术,“在南国和北国也都只剩下最鸡肋的能力”⁽⁴⁾——他只能隐约预知命运的大体走向,而不能精确知道每一个细节,或者他明明预见命运的结果,却无力改变,故事中阮明空的屡屡叹息,使故事染上忧郁犹疑的低回气息,也提示着这位神通广大的高僧面对命运和因果的无奈,对人因欲望、执着导致的愚蠢、迷失的忧虑。读完这样的故事不仅不能使我们得到于现实人生有明确指导性的训诫,反而会使我们对人的有限性和命运的难以把握有更深感知。

《喻世明言》中这两篇故事的确定性正与其说教性有关。通俗文学总是具有说教性,虽则要达成读者内心潜意识的满足,也需要传达一种确定的价值观念,忧

郁、惆怅、犹疑等不确定的“负面情绪”皆与说教性犯冲,尤其是《明悟禅师赶五戒》还带有强烈宗教(佛教)宣讲性质,因宗教门户之见而排斥本派之外的一切可能性,其说教性比着眼于世俗教训的一般通俗文学更强,也更具有独断气质。

《明悟禅师赶五戒》中的转世与《下一世欲主国家这辈子必要出家?》和《月明和尚度柳翠》的另一不同之处在于,后两篇只是犯戒僧人投胎转世,前者则是犯戒者(五戒)与道友(明悟)双双转世,颇类似于当下穿越文学中流行的“双穿”(两人同时穿越)。明悟在前世对五戒的犯戒有所讽喻,转世后化身佛印仍然充当化身苏轼的五戒的精神导师。由于苏轼身份的特殊性,《明悟禅师赶五戒》如果撇除高僧破色戒情节和宗教的门户之见的话,还是一个高僧大德转世为著名文人的故事,这也是中国文学尤其是文人笔记中颇为流行的母题,有着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直到现代仍有其遗风流韵,比如周作人身上便附有这样的传说。据周作人自述,他出生时一位堂叔半夜回来“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但转瞬却是不见了”,后半夜周作人便出生了,此后更讹传为周作人为和尚转世。周作人历来信奉“清明理性”精神,自然不会真的相信自己是老僧转世,在回想录里也明确指出这是“传说”“讹传”,甚至为堂叔的所见做合理化解释——“可能是他的眼花,所以有此错觉”,但也说“我对这种浪漫的传说,颇有点喜欢”,并由此产生自我暗示,半推半就地以此为题做了不少文章。1931年“梦中得一诗”：“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⑤后来的五十自寿诗,亦有“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之句,引来一群文友唱和,成为引起轩然大波的文学事件。周作人的传说由“老人转世”讹传为“老僧转世”,本身便可见“老僧转世”更契合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而周作人最讨厌宗教式的独断,他的自述切断了一切宗教迷信、宣讲的成分,只留下文人趣味。

在传统文人社会里,被认为老僧转世的多是名臣硕儒。《侯鯖录》卷七说到张安道、苏轼入僧舍便悟前生事,有议论曰:“乃知性慈慧者,必是大修行中来,非

一世薰习所致。”《扞虱新话》卷十五《房瑄娄师德张文定苏东坡知前身》中提及房瑄前身为永禅师,更说“岂世所谓聪明英伟之才者必自般若中来耶?”^⑥这类传说在文人中的流传,可以说明当时社会佞佛风气之盛,人们认为出家为僧是一种修行,也是行善,所以得到福报,后世转为帝王将相。《坚瓠续集》卷四有“前身”一则,详细罗列诸名人前后身。^⑦文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制造、配合完成这类佳话,既是一种游戏,也可以增加神秘趣味,抬高身价,形成自己“性慈慧”“聪明英伟”的形象。从佛教一面来说,也借助文人的名气扩充了宗教影响。这里自然有为佛教张目之处,但其效果也只是引人向道而已,而向道的结果也不过是来世成为名流,着眼处仍在世俗。文人与佛教可以说是双赢。《明悟禅师赶五戒》中的独到之处,便在于它使佛印与苏轼形成正反对比,以贬低世俗名流(苏轼)的方式彰显佛教教义才是通往真理的唯一法门。

这类高僧转世为文人的故事多与苏轼有关,也源于名人效应。苏轼本就是少有的生前身后皆享大名的文人,而又性格豁达,与儒释道皆能有所会心,并不偏执一家之见,与僧人亦有交往,活该他被编入这类故事里。褚人获《坚瓠九集》卷一“子瞻前后身”,提到袁宗道说苏轼前身为五祖戒和尚,后有宋代径山杲和尚和明末诗人董斯张。褚人获指出其中不合情理处,即径山杲出生时,尚有十余年苏轼方才去世。尚有逆推苏轼前十三世为汉代邹阳的,两人相差一千多年,平均每世90年,按照古人寿命情况,似乎难以填满,如果不以“仁者寿”来解释的话,则说明转世时相邻两世之间亦有时间间隔,灵魂有在冥界后台休息的时间,并非马不停蹄地辛苦做人。褚人获解释人们热衷于编造苏轼前世身后故事的心理:“总是一个大苏,沙门扯他做妙喜老人(引注:即径山杲),道家又道是奎宿”,又作诗云:“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一切都不过是“纵好事者为之,亦词场好话柄也”。^⑧所谓“好话柄”,正是谈资,文人趣味。佛道二教争相扯拽,也可见两教于世俗中人才争夺大战的激烈。当然,根据今天流传下来的相关故事来看,毕竟还是佛教占了上风。

于苏轼的前世之外而又关注后身,可见世人对于

他的喜爱,希望他不断转世,当然也有着对自己同代人褒奖的意思——比如认董斯张为苏轼后身,于董斯张来说,便是一种很高的肯定。另一类转世故事的主角则是那些在自己的时代遭遇了不公正待遇的名人,比如韩信、岳飞等,人们热衷于让他们转世,既是出于对他们同情,也是在维护善恶有报的社会伦理秩序。韩信为大汉打下大半疆土,最后却免死狗烹,不得善终,这样的遭遇本就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人们只好在转世上做文章。《三国志平话》于是使韩信和彭越、英布这两位大汉开国功臣同时转世,分别为曹操、刘备、孙权,刘邦、吕后则转世为汉献帝和伏皇后,曹、刘、孙三人分了大汉天下,尤其是曹操囚汉帝,杀伏后,算是报前世之仇,狠狠出了一口恶气,所谓“江东吴土蜀地川,曹操英勇占中原。不是三人分天下,来报高祖斩首冤”,(《三国志平话》开篇语)也证明了天理的确昭昭。这一故事在《喻世明言》中又有发展,便是《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不过冤冤相报何时了,三分故事里,刘备仁义而曹操奸诈,最终却是魏晋一统,后人仍然会觉得不公,于是民国奇人周大荒写了一个三国同人小说《反三国志》,使刘家一统天下,蜀汉一系大团圆。

刘关张三兄弟身上寄托了中国人许多理想,所以反复转世,朱琏在《下一世欲主国家 这辈子必要出家?》的“琏案”中列举了两个例子,刘备分别转世为乾隆皇帝和嘉靖皇帝,这与本篇故事中的李神宗颇有相似之处,似乎两人皆是皇帝专业户,每转世必为帝王。而高僧转世总是帝王将相,则可见安南佛教风气与中华并无不同,“性慈悲”“聪明英伟”者总是从前世乃至累世佛教修行中来,“下一世欲主国家,这辈子必要出家”的判语在此地亦大半成立。所不同者,仍在于中土转世故事更看重的还是意义的传达,要使天理得到伸张,伦常秩序得以不坠,也证明惩恶扬善的天道阴司为实有,而朱琏讲述的安南故事,更多的是游戏,于游戏中传达的,正是对确定意义的怀疑。当然,这与其说是安南故事的意思,毋宁说是朱琏的意思。

“安南”故事在今天于我们而言,自然属于外国文学,可是即便是对“安南”文化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国读者,阅读《安南怪谭》也常常觉得亲切,虽然多有与中国文化异质之处,却也总能从中感到熟悉的气息。故事中北国、北朝常常是强大力量、技术(包括法术)的来源,而代表北方天朝力量的“北朝”使者,在安南故事中又总显得蛮横而愚蠢——“北朝”正是安南的一面镜子,代表着他们的渴望,其中也有一些警惕与恐惧。本文开头提到的,他们尊中国名将马援为“白马大王”,又将马援留下的士兵称为“马留”,正是这种双重心理的反映。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也不妨把“安南”当作一面镜子,时时勤拂拭,使我们在向外部打开时反观自身,在安南故事里照见自己,看出自己更完整的形象与更多的可能。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9ZDA27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

- (1)(2)(3)(4)朱琏:《安南怪谭》,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77页,第123—124页,第126页,第116页。
- (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140页。
- (6)(8)转引自谭正璧:《三言两拍源流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20—221页,第227页。
- (7)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8页。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涛)